

新海洋政策下土耳其出兵利比亚 及其影响*

[卡塔尔] 伊马德·卡杜拉 著 侯宇翔 编译

内容提要 土耳其历史上曾在地中海、黑海和红海等海域建立过强大的海上势力。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土耳其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发展，东地中海勘探发现大量天然气，全球性大国和地区强国在该地区利益争夺加剧。蛰居大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土耳其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提出“蓝色家园”理念，制定新海洋政策，努力扩大海洋版图，与地区和国际势力对抗，大力维护自身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土耳其为扩大海上势力，加强了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地位，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订海洋和军事协议，并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以此与欧盟、俄罗斯和埃及等国际和地区势力抗衡。东地中海版图的重构或将演变为长期冲突的开端，未来出现军事紧张局势或开展基于新格局的国际谈判等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关键词 中东国际关系 土耳其 东地中海 “蓝色家园” 利比亚 军事行动

作者简介 [卡塔尔]伊马德·卡杜拉,卡塔尔阿拉伯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

译者简介 侯宇翔,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东学院院长、阿拉伯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北京 100024)。

土耳其被视作海洋国家，不仅缘于其地理上漫长的海岸线，同时也同其长期的海洋政策与活动有关。16~17 世纪，土耳其在地中海、黑海、红海、阿拉伯湾以及印度洋海域占据统治地位，一度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土耳其安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ZDA238)、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9GBQY015)、北京市属高校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培养计划资助项目(3002/C3002200504)的阶段性成果。

处大陆一个世纪后，随着自身国力增强和地缘政治压力加大，开始积极扩大自身专属经济区，主动参与东地中海区域油气资源勘探竞赛，加强海上势力及活动合法性，努力维护国家安全和能源利益。2019年，土耳其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订海上和军事两项协议，正式宣布推行新海洋政策。土耳其副总统福阿特·奥克塔伊（Fuat Oktay）认为，协议将开启土耳其海洋政策新的阶段^①。此外，土耳其外交部海洋边界司司长卡加泰·伊尔吉耶斯（Cagatay Erciyas）也指出，土耳其与利比亚的协议是一个政治信号，即不能忽视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的作用。^②

近年来，土耳其从21世纪前十年仅使用外交手段和软实力转变为以硬实力介入地区冲突。事实上，各国外交政策无非是通过维持现状寻求安全，或依靠自身实力进行先发制人和干预（pro-action seeking）改变局势。因此，“一国能否改变现状为自身利益服务，取决于国家实力、与他国力量对比、外部环境和他国政策等因素。”^③现实主义学派强调面对国家间的长期冲突趋势，一国可通过军事手段来展示其国家实力和地位，以保障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混乱将引起各国对力量平衡的担忧，国际和地区体系结构也迫使各国高度重视这种力量。^④基于此，本文拟从历史和当前现实角度探讨土耳其的新海洋政策的核心内容、动因与实施路径，最后尝试给出本文的结论。

一 土耳其海洋政策的历史演变

土耳其海洋政策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重大变化。奥斯曼帝国末期和现代土耳其建国初期，因国力较弱，土耳其海洋政策趋于保守。随着土耳其经济、军事和工业实力的增强，特别是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执政

① “US Coordinating with Turkey in Libya”, *Daily Sabah*, June 24, 2020.

② Selcan Hacaoglu & Firat Kozok, “Turkish Offshore Gas Deal with Libya Upsets Mediterranean Boundaries”, *World Oil*, June 12, 2019.

③ Clifton Morgan & Glenn Palmer, “A Two – Good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An Application to Dispute Initiation and Reciprocation”,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2, No. 3, 1997, pp. 227 – 228.

④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Summer 1990, pp. 12 – 13; Stephen M.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No. 110, Spring 1998, p. 30;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p. 19 – 21.

后，土耳其海洋政策愈发主动，凸显实用主义特色。

（一）奥斯曼帝国时期和共和国初期：较为保守的海洋政策

土耳其控制海洋彰显国家实力的理念源于奥斯曼帝国时代。随着版图大幅扩张，毗邻黑海、红海、阿拉伯湾和地中海等水域的奥斯曼帝国致力于加入国际贸易网，其海洋霸权在塞利姆一世和苏莱曼一世两位素丹执政期间达到顶峰。1517年，塞利姆一世素丹直接控制埃及后，地理学家贝里·拉里斯（Peiri Reis）向素丹奉上其绘制的世界地图，素丹凭借该地图策划了印度洋海域的军事行动。苏莱曼一世素丹着手建造海军，以海鲁丁·巴尔巴鲁萨（Hayreddin Barbarosa）为指挥官，控制了地中海海域。^①虽然奥斯曼帝国在1571年勒班托海战中败于欧洲天主教国家神圣同盟后势力衰退^②，但仍具有一定影响力，直至18世纪末始终控制着从希腊到阿尔及利亚的地中海东海岸和南海岸，而东海岸直到20世纪初仍完全受其控制。1911年，奥斯曼帝国失去对利比亚的控制，这是其丢失的最后一个地中海南岸国家。

1915年，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在达达尼尔海峡恰纳卡莱地区的战斗中取得胜利，阻止了当时的英国控制土耳其海峡及其重要城市伊斯坦布尔。^③1936年的《蒙特勒公约》保障了土耳其对自身海峡的控制权。^④此外，1974年，土耳其对塞浦路斯实施军事干预，使其战胜了受西方支持的希腊和希腊裔塞浦路斯人，解决了土耳其始终无法突破并涉足塞浦路斯岛以西海域的问题。

（二）正发党执政初期：提出“蓝色家园”理念

2002年，正发党开始执政，着手制定更为主动的海洋政策。甚至在该党成立之前，其重要成员已经表现出对海洋政策重要性的认识。早在1994年，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就表示，伊斯兰国家控制下的海峡和海洋通道联合后

① Bezen Balamir Coşkun, “Soul Searching in the Gulf: From the Ottoman Age of Exploration to Strategic Depth and Trading State”, in Özden Zeynep Oktav & Helin Sarı Ertem eds, *GCC – Turkey Relations: Dawn of a New Era*, Cambridge: Gulf Research Centre, 2015, pp. 50 – 51.

② Andrew C. Hess, “The Battle of Lepanto and Its Place in Mediterranean History”, *Past & Present*, No. 57, November 1972, pp. 53 – 55.

③ Metin Gurcan & Robert Johnson eds., *The Gallipoli Campaign: The Turkish Perspective*,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 17.

④ Norman Pounds, *The Turkish Straits, Political Geography*, New York, NY: McGraw – Hill, 1972, pp. 288 – 289.

具有重大世界影响力，并指出了土耳其可以发挥的作用。^① 2010年他任外交部长后，强调需突出海洋在国家发展建设中地位的重要性，表示“通过标记邻近海域确定土耳其的海洋政策，我们试图彰显国家在黑海、地中海东部、里海以及巴士拉湾（即海湾）的势力范围”^②。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还创造了“蓝色家园”（Mavi Vatan）的概念^③，由海军上将拉马丹·吉姆·古尔德尼兹（Ramazan Cem Gurdeniz）在2006年首先提出。这是一个涉及国防的新概念，即“国家”不再局限于陆地，同时也包括海洋或“水上国家”。

（三）正发党执政第二个十年：新海洋政策日渐成熟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土耳其经济、工业和军事实力显著增强，其新海洋政策愈发成熟。

第一，“蓝色家园”成为土耳其新海洋政策核心理念。2019年3月，土耳其舰队在东地中海举行“蓝色家园”演习，该理念随后得到广泛应用。^④同年9月，埃尔多安站在一幅展现土耳其海洋背景的地图前发表讲话，推介“蓝色家园”理念。^⑤正发党和民族行动党均采纳这一理念并奉行此种地区政策，强化土耳其民族主义，赢得了国内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部分反对党此后批评政府并反对将协议与向利比亚派兵挂钩，但他们也为与利比亚的海洋协议投了赞成票。^⑥2020年8月21日，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在黑海发现大量天然气，储量达3200亿立方米^⑦，这进一步强化了“蓝色家园”理念，使之成为未来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重要指针。

第二，国家安全和能源利益是土耳其新海洋政策核心内容。在“蓝色家

① Ahmet Davutoglu, “The Clash of Interests: An Explanation of the World (Dis) Order”, *Intellectual Discourse*, Vol. 2, No. 2, 1994, p. 120.

② Ahmet Davutolu, “The Power Turkey Does Not Use Is that of ‘Strategic Depth’” (interview), *Turkish Daily News*, June 14, 2010; Simon Waldman & Emre Caliskan, *The New Turkey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280.

③ Rayan Gingeras, “Blue Homeland: The Heated Politics Behind Turkey’s New Maritime Strategy”, *War on the Rocks*, June 2, 2020.

④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Turkey Wades into Libya’s Troubled Waters”, *Crisis Group Europe Report*, No. 257, April 2020, p. 7.

⑤ Michael Mackenzie, “Turkey’s Blue Homeland Sea Doctrine Sails on Despite Admiral’s Resignation”, *Ahval*, May 29, 2020.

⑥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op. cit., pp. 8–9.

⑦ “Turkey Discovers 320 Billion Cubic Metres Natural Gas Reserve in Black Sea”, *Hurriyet Daily News*, August 21, 2020.

园”理念基础上制定的政策有别于传统政策，其目的不限于保卫土耳其的海岸与海峡，而是延伸至公海，以国家安全和能源为核心内容。2012年3月，海军上将穆拉德·比勒吉勒（Murat Bilgel）表明了土耳其海洋战略的目标，即“超越海岸地区，在公海占据有利地位，增强实力避免他国‘利用我们的海域’，展现我们的力量”。土耳其海军司令博斯坦哲奥卢（Bostanoglu）上将在2013年9月强调“土耳其对海上威胁的判断‘以能源为基础’，捍卫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的利益是海军最首要的任务”^①。

为扩大海洋专属经济区、触及公海并保证能源钻探利益，土耳其需要与东地中海沿海国家签署划界协议并确定海洋管辖权。2010年，塞浦路斯与以色列签署海洋划界协议，以期吸引跨国企业勘探天然气提供法律上的便利。这促使土耳其在2011年9月与“北塞浦路斯”签订东地中海油气勘探协议^②，但是这项协议不能完全满足土耳其的需求，因为除土耳其外，国际社会并不承认“北塞浦路斯”，且协议范围仍然局限于狭小的近海区域。

鉴此，土耳其试图与埃及、利比亚签订海洋划界协议。土耳其曾尝试与埃及时任总统穆巴拉克签署协议。但是，始自2010年底的阿拉伯剧变使上述两国发生政权更迭并陷入动荡，从而打断了土耳其的计划。海军上将吉哈德·亚伊吉（Cihat Yayci）是推动土耳其与利比亚签署双边划界协议并制定海上行为准则的推手。他的观点既是2010年欧盟与非洲峰会期间土耳其向卡扎菲提议的雏形，也是2019年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订的关于“划定地中海海洋管辖权区域”谅解协议的基础。

二 土耳其新海洋政策的背景与动因

埃尔多安政府推出“蓝色家园”新海洋政策，主要基于经济与地缘政治等现实因素考量，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大规模天然气发现刺激土耳其地勘动力。东地中海地区碳氢行业发展起步于80年前，但是大储量天然气的发现却始于1999年以色列和加沙

^① Tolga Demiryol, “Between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Turkey and the Prospect of Energy Cooperation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Turkish Studies*, Vol. 20, No. 3, 2019, pp. 454–455.

^② Eric R Eissler & Gözde Araslı,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The RUSI Journal*, Vol. 159, No. 2, 2014, p. 78.

海岸附近储量为12亿立方米的诺阿(Noa)气田。以色列在2000年、2009年和2010年相继发现储量分别为300亿立方米、3200亿立方米和6000亿立方米的“玛丽-B”(Mari-B)气田、塔玛尔(Tamar)气田以及最大深海气田——黎凡特(Leviathan)气田。塞浦路斯于2011年发现了储量约为1290亿立方米的阿佛洛狄忒(Aphrodite)气田。埃及则在2015年发现了东地中海迄今为止最大的扎赫尔气田,探明储量约为8450亿立方米。^①土耳其在东地中海发现大量天然气后自给率将大幅提高,推动它在新海洋政策中采取更为坚决的立场。土耳其能源部长和外交部长均表示,“这将使土耳其成为能源领域的重要参与者”^②。

美国地勘局报告显示,该地区可开采储量约为122万亿立方英尺(约合3.42万亿立方米)^③,从而促使各国争夺能源利益,保障能源安全。土耳其天然气98%依靠进口,其中半数以上来自俄罗斯^④。东地中海区域天然气田的大规模发现,使土耳其地区竞争对手对土耳其形成了经济和地缘政治优势,也刺激土耳其迅速采取新的海洋政策,推出自己的地勘计划。

第二,法律地位分歧催生土耳其确立自身管辖权的尝试。土耳其与希腊和塞浦路斯在专属经济区及其法律地位上存在分歧。一是各国海域划分的法律原则不同。希腊和塞浦路斯认为,专属经济区以法律形式确定,而土耳其则依据大陆架原则。2003年至2010年间,塞浦路斯、埃及和以色列三国签订了一系列双边专属经济区划界协议。2007年,塞浦路斯又与黎巴嫩签订了专属经济区协议。土耳其对此表示抗议,称塞浦路斯—黎巴嫩协议和埃及—希腊协议侵犯了土耳其和“北塞浦路斯”的主权。^⑤事实上,分歧根源是因为土耳其并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① Tolga Demiryol, op. cit., p. 448; Eric R Eissler & Gözde Arasil, op. cit., p. 76; Delek Drilling, “The Natural Gas Revolution in Cyprus”, <https://bit.ly/3dSP3u7>, 2020-06-30; Hasan Selim Özertem,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d The Energy Bonanza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18, No. 4, 2016, p. 363.

^② “Turkey Discovers 320 Billion Cubic Metres Natural Gas Reserve in Black Sea”, *Hurriyet Daily News*, August 21, 2020.

^③ Gareth M. Winrow, “The Anatomy of a Possible Pipeline: The Case of Turkey and Leviathan and Gas Politic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18, No. 5, 2016, p. 431.

^④ “Meeting of High-Level Cooperation Council between Russia and Turkey”, April 8, 2019, <https://bit.ly/3emeK6E>, 2020-07-13; World Nuclear Organization, “Nuclear Power in Turkey”, May 2015, <https://bit.ly/3fHMh0>, 2015-08-23.

^⑤ Tolga Demiryol, op. cit., p. 451.

Seas, UNCLOS) 签约国, 而希腊和塞浦路斯均签署了这项公约。土耳其呼吁通过多边而非双边协议方式划定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 保障第三方主权。土耳其政府也担心重新划定海洋边界会损害自身利益, 使其在爱琴海的地位受到威胁, 而且土耳其与希腊长期就大陆架存在分歧。此外, 塞浦路斯问题直接关系到土耳其的国家形象。土耳其认为塞浦路斯的自然资源由该岛两大种族所共有, 坚持希腊裔塞浦路斯人不应该单边进行海上划界, 必须保障土耳其裔塞浦路斯人应有的份额, 或待双方达成共识统一塞岛后进行。^① 二是塞浦路斯不顾岛内分裂状况等方面划定海洋边界。希腊裔塞浦路斯因获国际社会承认, 单方面开展钻探活动。2007年1月6日, 他们单方面将塞浦路斯岛附近的钻探田分割为13个区块。而土耳其认为, 其中1号、4号、5号、6号和7号区块与土耳其大陆架存在交叉。^②

第三, 相互竞争的天然气输送项目造成地区集团合力排挤土耳其。以色列、希腊、塞浦路斯和埃及之间建立的新地区联盟引发了土耳其的安全担忧。上述四国组建了“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Eastern Mediterranean Gas Forum), 得到了欧盟和美国的支持。然而, 该组织成员国并不包括土耳其和“北塞浦路斯”^③, 以及未与以色列建交的叙利亚和黎巴嫩。

同时, 东地中海正在建设的对欧洲的天然气输送项目, 没有考虑土耳其国内成本更低、物流更便捷、地理位置更合适的项目。其一是位于塞浦路斯的瓦西里克斯(Vasilikos)地区的液化天然气站, 该项目由于土耳其和塞浦路斯间的政治分歧而停止。其二是东地中海海上管线从以色列出发, 经塞浦路斯连接克里特岛, 最后抵达希腊大陆, 其间穿越土耳其海域。该项目可加强欧洲的能源供应安全, 为希腊带来经济利益和能源技术支持, 但同时极可能导致希腊和土耳其关于大陆架的纠纷进一步恶化。其三是连接以色列和土耳其、长度为500公里的海底管线, 将地区多余的天然气输送至欧洲。项目拟耗资约25亿美元。^④ 该地区上述三个潜在并相互竞争的对欧洲天然气输送项目, 意味着地缘政治竞争优于市场因素。

^① Tolga Demiryol, op. cit., pp. 451-452.

^② Gareth M. Winrow, op. cit., p. 442; Mehmet Efe Biresseliolu, "Clashing Interest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Insight Turkey*, Vol. 21, No. 4, Fall 2019, p. 124.

^③ Mehmet Efe Biresseliolu, op. cit., pp. 118-119.

^④ Mehmet Efe Biresseliolu, op. cit., p. 127; Tolga Demiryol, op. cit., p. 450.

第四，土耳其的地缘政治环境趋于恶化，东地中海地区冲突加剧。2010年土耳其和以色列交恶前，东地中海区域并不存在反土耳其地区集团。例如，2007年土耳其和以色列谈判进入实质阶段，双方决定实施东地中海区域石油、天然气、水、电和光缆五条管线互联的“地中海溪”（Med-Stream）项目；2008年，双方又决定修建连接杰伊汉港和阿什凯隆的石油管线。^①土、以双边项目当时还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即使在2014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约瑟夫·拜登仍表示“建设连接以色列、塞浦路斯和土耳其的天然气管线，为欧洲提供能源，将使土耳其和希腊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②。土以关系交恶后，特别是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执政期间，以色列与土耳其分歧的加剧意味着地区势力冲突已演变为东地中海当前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成为地区新集团形成的基础，各方为本国项目和利益目标展开激烈竞争。

综上，土耳其新旧海洋政策虽然不尽相同，但政策长期间断是因为土耳其在当代历史中缺乏单独施策的必要实力，尚未形成对外海洋政策，缺少控制海洋区域的经济动力，以及人们此前尚未认识海洋中蕴藏的巨大碳氢资源。近年来，地中海地区勘探发现大量油气资源，以色列、希腊、塞浦路斯和埃及等国积极成立“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等地区联盟，希腊与埃及签署海洋划界协议。^③与此同时，土耳其经济、工业和军事实力得到巨大发展，它与埃及、阿联酋和沙特等地区国家以及法国、俄罗斯等世界强国在中东地区的竞争也越发激烈，土耳其的新海洋政策也开始发展成熟，这一政策的法理体现即是与利比亚达成持续共识。

三 土耳其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及其国际反应

土耳其新海洋政策提出后，埃尔多安政府聚焦东地中海地区，积极尝试与该地区国家签署海上协议，加快确权行动、增强海上势力。2019年11月，土耳其与利比亚签署了划定海上管辖领域的谅解备忘录和军事合作谅解备忘

^① Kivanç Ulusoy, “Turkey and Israel: Changing Patterns of Alliance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22, No. 3, 2020, p. 415.

^② Gareth M. Winrow, *op. cit.*, p. 433.

^③ Hellenic Republic,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tatement of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Nikos Dendias, following the Signing of the Agreement on the Delimitation of EEZ between Greece and Egypt”, August 6, 2020, <https://bit.ly/33Sxbyg>, 2020-08-10.

录。其中，后者也是土耳其新海洋政策基础内容的体现和必要延伸。同时，它也宣示了土耳其现行外交政策的转变，其核心特点之一即以硬权力方式介入地区冲突。出兵利比亚给土耳其外交政策带来诸多新的变化，同时也在国际层面产生了激烈的反应。

第一，军事干预利比亚是土耳其践行新海洋政策的重要内容。在土耳其看来，利比亚是土耳其新海洋政策的关键因素。如果没有与利比亚签订海洋划界和军事援助两项协议，土耳其军队无法停留在公海并将其势力延伸至地中海腹地。因此，支持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和最高国家委员会对延续土耳其新海洋边界管辖权至关重要。为保障未来利比亚政府继续履行海洋划界协议，确保协议获得利比亚稳定后首个议会的批准，土耳其大力支持民族团结政府取得关键性军事胜利，增加该政府在任何政治解决方案中的谈判筹码，加强政府代表在未来政府组成中的实力。如果没有这种支持或干预，利比亚国内反土耳其派系以及与土耳其竞争的地区国家势力可能会坐大，威胁土耳其在利比亚的利益和在地中海区域的海上存在。其二，军事干预利比亚是土耳其外交政策核心变化的最好体现。土耳其重视通过跨境军事行动展现实力来捍卫外部利益，在与竞争者的对抗中支持盟友。其三，军事干预利比亚，既可以强势体现其以武力方式对抗法国、俄罗斯等大国对土耳其国际战略空间的挤压，也是对埃及损害其政策和利益的回应。埃及联合阿联酋、沙特两国在阿拉伯地区同土耳其和卡塔尔对抗，联合希腊、塞浦路斯和以色列将土耳其限制在狭窄的海洋地带，在东地中海能源项目中排挤土耳其。通过对利比亚的干预，土耳其势力得以直达埃及边境，从而对策划上述反土耳其政策的塞西政权形成战略威慑。

第二，出兵利比亚是土耳其军队在共和国历史上首次单独开展境外行动，彰显其“蓝色家园”理念下强势争夺东中海权益之要义。自2011年卡扎菲政权被推翻以来，利比亚便成为国内、地区和国际冲突的战场。自2014年8月起，利比亚国内相互竞争的政治势力为控制政治权力而展开斗争。图卜鲁格国民代表大会和的黎波里国民大会分裂后，冲突各方不论合法性如何，都参与了联合国特使贝尔纳迪诺·莱昂主持的和平谈判，但对话并未成功。此后，新任特使马丁·科布勒成功推动各方在2015年12月达成协议，组建统一的政府、议会和军队，在的黎波里成立国家最高委员会，并成立以法伊兹·萨拉吉为总理的民族团结政府，协议和政府获得了联合国的承认。但是，双方

签署协议后军事冲突进一步加剧，国内冲突也引发了范围更广的地区竞争。2019年4月，以哈利法·哈夫塔尔为首领的利比亚国民军向的黎波里发动全面进攻，旨在终结民族团结政府的存在，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危机，利比亚形势急转直下。

随着哈夫塔尔军队成功逼近的黎波里，埃尔多安总统指出，利比亚面临的挑战源于支持哈夫塔尔的国家，是局势恶化的责任方，表示土耳其将努力“帮助利比亚避免沦为失败的国家”。他暗示土耳其将进行干预，从“受部分阿拉伯国家支持的独裁者”手中拯救利比亚政府，土耳其“将一如既往地坚定支持利比亚兄弟，竭尽全力挫败将利比亚变为另一个叙利亚的企图”^①。于是，当哈夫塔尔军队在2019年11月威胁到民族团结政府后，土耳其决定提供支持并进行干预。这些支持包括向的黎波里派遣军官、运送武器和防空装备。土耳其的支持和干预延缓了哈夫塔尔军队的进军，民族团结政府的军队得以收复部分丧失的地区，但它未能中止战争或让哈夫塔尔的军队远离的黎波里周边地区和部分利比亚西部城市。因此，土耳其开始为大规模的正式干预和公开驻军做准备。土耳其官员表示，利比亚的严峻形势和民族团结政府的正式求助，促使该国决定进行军事干预。^② 2020年1月2日，土耳其议会批准与利比亚的海上和军事协议后，军方随即在利比亚境内组建作战和军事培训中心，协调和管理向民族团结政府提供的援助。^③ 2020年1月10日，德国倡议召开的利比亚问题柏林会议未能促使各方停火，也没能阻止各国继续向利比亚冲突各方提供军备，在哈夫塔尔军队持续轰炸的黎波里并威胁占领后，土耳其着手准备向民族团结政府和土耳其军事作战中心运送大量武器装备、防空系统和无人机。2020年5月，土耳其针对哈夫塔尔的基地和补给线发动猛烈空袭，实现了快速的军事胜利，民族团结政府因此全面收复西部城市、的黎波里周边地区、的黎波里国际机场、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军基地以及塔尔胡纳，逼近苏尔特和战略要地朱法拉基地。^④

第三，在土耳其支持下的民族团结政府逼近苏尔特和朱法拉基地的节点

① [土耳其] 伊姆拉·凯基利：《利比亚危机中的土耳其方式》（阿拉伯文），载土耳其广播电视台网站阿拉伯语频道：<https://bit.ly/2VMOtSL>，2019-05-13。

②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op. cit., p. 1.

③ “Turkey Begins Deploying Troops to Libya, Says Erdogan”, *DW*, May 1, 2020.

④ Tarek Megerisi, “It’s Turkey’s Libya Now”, 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y 20, 2020, <https://bit.ly/38v97Sd>, 2020-05-30.

上,国际和地区力量强势参与危机,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采取政治解决方案并防止军事冲突升级。危机参与方担心民族团结政府抵达石油新月地带和东部地区,从而实现其“利比亚全境受政府控制”^①的目标。虽然民族团结政府清楚停火意味着军队停止前进,但仍在2020年8月20日宣布停火,表示愿意通过总理和议会选举实现对全国的控制,让“外国军队和雇佣军”离开利比亚。^②总的来看,在土耳其出兵利比亚问题上,国际社会形成了两种态度,土耳其则分而应之。

其一,欧洲大国、欧盟和埃及等国支持政治解决方案。法国历史上曾殖民非洲,在2011年北约对利比亚干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卡扎菲政权倒台后,法国在利比亚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对法国来说,国民大会和民族团结政府与土耳其、卡塔尔关系稳固,意大利也与法国在未来利比亚利益问题上存在竞争。因此,2014年崛起的哈夫塔尔作为利比亚重要力量,正是保障法国在利比亚东部和南部利益的依托。同时,法国在利比亚有重要的天然气资源利益,尼日尔—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欧洲管线穿越萨赫勒和撒哈拉地区。此外,利比亚南部安全状况对法国至关重要。土耳其干预利比亚并在其西部取得重大进展后,法国越发担心土耳其势力会威胁其在利比亚乃至非洲的利益。因此,法国对土耳其的谴责日益严厉,要求“所有外国军队和雇佣军撤出利比亚全境,禁止违反联合国武器禁运决议向利比亚供应军事装备”,认为利比亚危机只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③法国总统马克龙指责土耳其应为利比亚冲突负“历史和刑事责任”。法国还试图推动北约对土耳其施压。法国国防部长弗洛朗丝·帕利(Florence Parly)宣布法国暂时退出北约在地中海地区的“海洋守护者”安全行动。土耳其外交部长迈乌吕特·查武什奥卢则谴责法国的行为是对利比亚的“破坏”。^④

欧盟也是地区热点问题的参与者。欧盟外长理事会会议一致认为,处理

① 《利比亚西部之后,民族团结政府军队开启收复苏尔特和朱法拉的胜利之路》,载半岛网:<https://bit.ly/2VPDbD2>,2020-07-06。

②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宣布停火,呼吁举行大选》,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阿拉伯语频道:<https://cnm.it/3grnZna>,2020-08-21;《利比亚停火宣言受到地区和国际欢迎》,载英国广播公司网站阿拉伯语频道:<https://bbc.in/34oGRk0>,2020-08-21。

③ “Europeans Call for Peaceful Settlement in Libya, Turkey Intent on Military Solution”, *The Arab Weekly*, June 10, 2020, <https://bit.ly/3gsxy5u>, 2020-6-20。

④ 《法国退出北约在利比亚的行动》,载德国之声网站:<https://bit.ly/3eXdXKm>, 2020-07-05。

土耳其在塞浦路斯专属经济区内的非法钻探活动等“严重问题”至关重要，呼吁土耳其为政治解决利比亚问题做贡献，尊重联合国武器禁运决议，避免事态升级。^①“但欧盟内部在诸多外交政策上存在分歧，其中就包括对抗衡土耳其的重视程度。推动对土耳其采取强硬政策的国家是法国、希腊和塞浦路斯，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博雷利（Josep Borrell）的表态更能代表整个欧盟立场，他认为“原则上不会把制裁摆上桌面”，“制裁始终是实现目标的工具，而不是政策本身”^②。此外，欧盟还接受土耳其和希腊两国达成的解决方案，博雷利表示“应该通过对话和协商而非单边行动和海军动员来确定海上边界”^③。由于其内部无法达成共识，欧盟与土耳其进行集体军事对抗并不现实，况且土耳其享有对北约决议的否决权，加之美国乐见土耳其在利比亚能有效威慑俄罗斯，上述情况鼓励土耳其不顾欧盟反对，继续坚定地推行其政策。其结果是，欧盟此前完全反对重新划界，但现阶段已同意通过谈判方式解决海上边界问题，此举或使土耳其在近期行动中获益。

俄罗斯把利比亚看作其重要的军售市场，在卡扎菲当政期间视其为国际盟友。但2011年利比亚政权更替后，俄罗斯认为哈夫塔尔是保障其在利比亚利益的潜在伙伴，包括进入利比亚能源市场、使用图卜鲁格和德尔纳的地中海港口以及与俄罗斯共同反对政治伊斯兰势力。而且，从战略角度看，俄罗斯希望通过控制叙利亚、利比亚，获得毗邻北约和欧洲南翼的广阔势力舞台。^④于是，2018年哈夫塔尔取得军事优势、逼近的黎波里后，俄罗斯向利比亚派遣了瓦格纳公司等私人武装部队，参与了特定的军事行动，包括提供技术支持、电子战经验和直接参与战斗^⑤。美国非洲司令部（AFRICOM）也公布了由俄罗斯军事人员驾驶的俄罗斯战机在利比亚上空盘旋的照片^⑥，这些

① European Council, “Foreign Affairs Council, 13 July 2020, Turkey”, <https://bit.ly/3fvwNbH>, 2020-07-14.

② Zoe Didili, “EU, Turkey Clash in First Meeting after Hagia Sophia Decision; Borrell Warns of Possible Sanctions over Drilling”, *New Europe*, June 14, 2020.

③ “EU Concerned about Turkish, Greek Naval Deployment”, *Ekathimerini*, June 9, 2020.

④ Amy Mackinnon, “Russia and Turkey’s Proxy War in Libya Heats Up”, *Foreign Policy*, June 19, 2020.

⑤ Michelle Nichols, “Up to 1, 200 Deployed in Libya By Russian Military Group: U. N. Report”, *Reuters*, May 6, 2020.

⑥ Mackinnon & Sudarsan Raghavan, “As Military Power Shifts in Libya, Turkey and Russia Control Country’s Fate”,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3, 2020.

战机进入利比亚可被视作对土耳其的警告，意味着如果民族团结政府和土耳其越过俄罗斯设定的“红线”（苏尔特），后者将使事态升级，强烈反对土耳其干预。^①而土耳其则认为，俄罗斯在控制叙利亚后进一步壮大在利比亚的势力，不仅是为了经济利益或占据有利地位抗衡欧洲（如在移民政策和难民潮问题上拥有对欧洲国家的施压工具），更是与希腊和塞浦路斯共同在东地中海地区封锁土耳其。虽然希腊和塞浦路斯目前主要倚靠欧洲和北约，但是面对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的军事优势，尤其是土耳其势力延伸至利比亚威胁两国海洋边界，俄罗斯在其中制衡土耳其的作用将得以发挥。^②

埃及及其传统盟友阿联酋和沙特认为，土耳其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是非法的。同时，埃及担心民族团结政府和土耳其支持的民兵组织会造成恐怖主义威胁，对塞西政权形成潜在威胁。塞西认为土耳其军事干预利比亚不仅是对埃及本土的潜在威胁，也是对埃及北非利益和地区计划的威胁。如果土耳其在利比亚实现长期存在，帮助民族团结政府盟友在利比亚未来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继续执行与其签署的海洋协议，或将削弱由埃及、沙特和阿联酋建立的阿拉伯地区反土耳其联合势力，破坏埃及、希腊、塞浦路斯和以色列间的东地中海海上联盟。埃及还认为土耳其和民族团结政府属于或支持政治伊斯兰运动，需要采取行动进行对抗。在土耳其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民族团结政府逼近东部大门苏尔特和朱法拉基地后，埃及的警告已经升级到可能对利比亚进行直接或间接军事干预的程度。塞西向军队表示：“埃及军队是地区最强大的军队之一……时刻准备好在国内执行任何任务，并在必要之时刻踏出国境”^③。塞西的讲话得到了阿联酋和沙特的支持，两国强调支持埃及“采取任何措施保护其安全和稳定免受利比亚令人担忧的局势发展影响”^④。《中东报》称塞西的声明“是对土耳其干预利比亚和封锁埃及西部边境企图的坚

① Mackinnon & Sudarsan Raghavan, “As Military Power Shifts in Libya, Turkey and Russia Control Country’s Fate”,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3, 2020.

② William Mallinson, Pavel Kanevskiy & Aris Petasis, “Then is Now, but the Colours are New: Greece, Cyprus and the Evolving Power Game between the West, Russia and Turkey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22, No. 3, 2020, pp. 307, 311, 316, 318.

③ 《塞西讲话之后埃及是否会军事干预利比亚?》，载英国广播公司网站阿拉伯语频道：<https://bbc.in/31Llk2F>, 2020-07-05。

④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认为塞西讲话“违反国际宪章”，沙特和阿联酋支持埃及立场》，载法国24小时网站：<https://bit.ly/2Z3tF1c>, 2020-07-05。

决回应”。因此，塞西强调“苏尔特和朱法拉”的重要性，将其视为“红线”^①，这与此前俄罗斯设定的红线完全相同。埃及难以接受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的推进以及通过利比亚将势力逼近埃及。但鉴于经济、安全和法律因素，埃及很难对利比亚进行直接军事干预，因此埃及最有可能朝两个方向行动：一是与利比亚东部的盟友协调军事行动，使土耳其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泥潭，无法结束战争或脱身；二是支持政治解决方案。埃及此前对民族团结政府和图卜鲁格国民代表大会的两份停火声明表示欢迎^②，借此延缓土耳其在利比亚的进展，或确保土耳其执行所有外国军队撤出利比亚的倡议，使后者出局。利比亚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和稳定后，土耳其在利比亚给埃及造成的威胁或将减少。但鉴于美国和北约至今没有强烈反对土耳其行为，欧盟亦呼吁和平解决分歧。埃及在东地中海问题上对土耳其的警告非但不会停止，反而可能升级。

其二，美国在利比亚发挥着近似于观察员的次级作用。美国原本对利比亚问题中互相竞争的盟国持中立立场，但后来由于担心俄罗斯势力坐大，美国立场转变为支持能够抗衡俄罗斯势力的土耳其。2011年，美国在推翻卡扎菲政权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在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克里斯多佛·史蒂文森（Christopher Stevens）遇袭身亡后，美国于2012年9月撤出利比亚，重视程度也随之下降。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遇袭事件，导致美国常年对利比亚境内的内部和地区冲突持漠视态度，对利比亚政策也局限于支持联合国行动，以发表笼统声明为主，没有为解决冲突提供实质性帮助，甚至在土耳其军事干预、民族团结政府控制利比亚西部后，美国给出的信息仍然是模糊的。美国助理国务卿戴维·申克尔（David Schenker）在2020年6月表示，“美国呼吁各方放下武器”^③。虽然美国采取了笼统的立场，但是哈夫塔尔及其利比亚东部的支持者们认为“美国支持其在利比亚西部的对手”^④。其对美国立场的抱怨源

① 《埃及针对土耳其干预利比亚的立场是地区“转折点”》，载《中东报》网站：<https://bit.ly/2D3gGDV>，2020-07-05。

② 参见《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宣布停火，呼吁举行大选》，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阿拉伯语频道：<https://cn. it/3gmZna>，2020-08-21；《利比亚停火宣言受到地区和国际欢迎》，载英国广播公司网站阿拉伯语频道：<https://bbc. in/34oGRk0>，2020-08-21。

③ “Libya: Conflict, Transition and US Policy”，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une 2020, pp. 21 - 22, <https://bit.ly/3iAAwqn>, 2020-07-05。

④ Ibid., p. 22.

于美国没有反对土耳其在利比亚日益加强的军事干预和军事存在，美国将土耳其的行为视作对俄罗斯的回答而不是干预。美国借理查德·诺兰德（Richard Norland）大使之口对俄罗斯的干预提出警告。^① 美国之所以采取该立场，是因为它还不愿意单独对抗俄罗斯。民族团结政府曾向美国提议建立军事基地抗衡俄罗斯势力，但美国未予答复。特朗普政府认为“利比亚冲突是欧洲问题，与美国利益关系不大”^②。此外，正如前文所述，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是利比亚问题中对抗俄罗斯、哈夫塔尔和瓦格纳公司的主力军，美国将土耳其视作能够发挥作用并负担成本的最重要参与者。美国也担心俄罗斯在利比亚沿海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威胁美国和北约的利益。2019年12月，美国非洲司令部认为“俄罗斯在利比亚不断壮大的军事存在将阻碍美国进入利比亚，从而威胁到未来美国的军事伙伴关系与反恐合作”^③。美国在改变立场后，开始重视俄罗斯势力的壮大及其对北约的威胁，将土耳其的干预视作对俄罗斯势力的平衡和遏制。但是，如果土耳其与俄罗斯在利比亚达成合作，美国的立场可能完全改变为反对土耳其的军事存在。此外，若利比亚各方就政治解决方案达成共识，国内局势实现稳定，美国可能要求土耳其和其他势力退出利比亚。因此，对抗俄罗斯在利比亚的势力是美国和土耳其共同的当务之急，也是两国共识的基础。如果干预没有得到美国同意或是默许，土耳其便无法应对北约内部欧洲伙伴特别是法国的强烈批评，也不可能至今免受国际谴责。

四 余论

本文从历史和地理维度阐述了土耳其海洋观及其政策的承继与发展，以及埃尔多安政府为扩大国家概念范围将视作其主权内的广阔海域纳入版图的努力。土耳其在专属经济区内建立长期海上力量，试图通过与利比亚签订海上协议获得法律认可，派遣勘探船坐实现状。通过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

^① “Libya: Conflict, Transition and US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une 2020, pp. 21 – 22, <https://bit.ly/3iAAwqn>, 2020 – 07 – 05.

^② Ferhat Polat, “Will the US Take on a Bigger Role in Libya?”, *TRT World*, March 5, 2020.

^③ “Libya: Conflict, Transition and US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une 2020, pp. 21 – 22, <https://bit.ly/3iAAwqn>, 2020 – 07 – 05.

订海上和军事两项协议，土耳其的两条外交线路实现相交：一是划定新海洋边界，与希腊和欧盟对抗；二是确认版图，为该国在地中海南岸即利比亚的地理和政治利益延伸助力。

土耳其鉴于自身国力的增强，在东地中海区域地缘政治局势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推行“蓝色家园”理念，制定并实施更为积极主动的新海洋政策。土耳其在新海洋政策下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将给土耳其造成深远影响。

从有利角度看，其一，土耳其在东地中海地区尤其利比亚高歌猛进，挑战地区和国际力量，彰显了其地区大国形象。虽然有关国家不会将利益拱手相让，势必将通过升级事态或寻求和解来限制土方利益，但是这些努力至今未能动摇土耳其继续执行新政策的意志。其二，土耳其通过与利比亚和“北塞浦路斯”签订海上划界协议，加强了自身在东地中海专属经济区争议中的有利地位，增加了勘探活动的合法性，有利于保障国家的能源利益。其三，土耳其与利比亚的军事协议为其加强在东地中海和地中海南岸的影响力创造了条件，扩大了战略空间，增强了土耳其应对地区环境压力的能力。

从不利角度看，土耳其的强硬姿态招致地区和国际势力的不满，遭受各方施压，增加了土耳其和东地中海区域的不稳定因素。其一，虽然欧盟出于抗衡俄罗斯势力的考虑，对土耳其立场发生重大变化，呼吁希腊和土耳其和平解决分歧。但鉴于希腊和土耳其长期敌对，前者难以在专属经济区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其二，俄罗斯虽然维持了与土耳其的联系，但为保障自身利益，势必阻止土耳其和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取得更大进展，或借助政治解决方案为其利比亚东部盟友谋求更大影响力。其三，埃及虽然也可能支持政治解决方案，但其深谙土耳其势力靠近边境的危险，极可能加强对利比亚盟友的支持以消耗土耳其，或加强与希腊、塞浦路斯和以色列的联盟，制造动荡局面和法律纠纷，使土耳其在该地区的存在不利于自身稳定和 international 影响力，相反成为负担。

东地中海版图的重构可能演变成长期冲突的开端，地区局势不确定性加大。在此形势下，未来各种情况均可能发生，如引发东地中海的军事冲突，土耳其也可能推动各方重新进行海上划界谈判，以改变自身被封锁在狭窄海洋地带的状况。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